

世界文化丛书

A SERIES OF
THE CULTURES OF THE WORLD



文化人类学的 理论构架

庄锡昌 孙志民编著



式
史
国
原
吐

文化人类学的 理论构架

庄锡昌 孙志民编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装帧设计：池长尧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构架

庄锡昌 孙志民编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1.625 插页2 字数248 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600

ISBN 7-213-00107-8/G·16

统一书号：7103·1363

定 价： 2.90 元

《世界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周谷城 田汝康

编委：庄锡昌（常务） 金重远 庞卓恒 迟 轲
祝 明 朱威烈 顾晓鸣 顾云深
马小鹤 孙志民 张宪章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今天我们立足于祖国的现代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不难看出：现在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正日益趋于紧密，各国家或各地区之间的往来日益方便；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密，几乎成了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但要使这些关系发展得很好，甚至合乎我们的理想，则研究、考察、寻找正确方向或理想前途的工夫，为不可少。着眼于文化方面的关系，组织学者、专家研究世界文化，出版世界文化丛书，已成了我们当前的迫切要求。

研究世界文化，先定出题目，请学者进行研究，写成专书，是可能的。学者自己先有研究计划，甚至已有研究成果，拿出来寻找适当的题目，更是可能的。我们组稿工作的进行，大体不外这些方式。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不加限制，是可以的，如“世界文化史”即属此类；估计这类著作不会很多。与此相反，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研究”即属此类；估计这样有限制的著作，一定相当多。介于这两极端之间，有的著作只在地区、时间上有所限制，如“中国先秦文化”或“美国现代文化”即是实例。有的甚至只在地区上有限制，如“印度文化”或“拜占庭文化”即是实例。此外研究文化的方法或理论，如“文化与时间”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

理论”等都是实例。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人的独创性。

至于文化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则不能忽视。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是不易明确的，这就要诉诸比较研究。即使诉诸比较研究，如果只拿现在与过去比，或拿中国与外国比，充其量只能了解文化的大势；必须进一步有具体细致的比较，才能把方向找出来。分别举例，如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相比，则知手工生产为落后，机器生产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落后、追求进步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宗教迷信与科学真理相比，则知宗教迷信为落后，科学真理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迷信、追求真理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压迫和剥削，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情；拿压迫剥削与平等互利相比，则知前者为可恨，后者是可贵的，于是反对压迫剥削、追求平等互利成了我们的方向。方向不能忽视，比较研究则大有助于方向的阐明。研究世界文化的学者、专家未必完全没有涉及过比较：把研究的对象完全孤立起来，不顾上下古今，不顾前后左右，是不可能的。今天谈比较，不过希望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再扩大，使比较的对象力求具体更具体。果能如是，则研究文化的方向或追求理想的前途决不会落空。余不多谈，即以此为序。

1986年10月6日写于北京

写在前面

庄锡昌

近年来，“文化人类学”在我国逐渐受到关注，研究者日多。其实，这门听来有些陌生的学科，早在100余年前就已在欧洲形成，传入中国也有80余年的历史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文化人类学在我国曾经热闹过一阵子，出现过一批文化人类学名著的译文和国内学者的有关著述。只是从五十年代开始，人类学被视为一门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被排斥，更无从谈及介绍和研究了。直至近年，人们重又认识到了它的价值，开始予以注意。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研究人类的学问”，研究的范围包括人本身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的对象也不仅仅限于人类。有些人类学家为了弄清“人类的起源”、“人与其他类动物之间的区别”……还进入非洲丛林深处研究“毛茸茸的灵长目动物”。

“文化人类学”，从狭义的角度理解，是指研究人类习俗的学问。如果相对于体质人类学而言，那么文化人类学的含义就广泛多了。它研究的对象包括整个人类文化现象。

文化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初，着重于研究原始人类诞生之初的状况。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Edward B.

Tylor, 1832—1917)被尊为“人类学之父”。他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被视为最早的文化人类学的典籍。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已在欧洲广为流传,泰勒逐渐摆脱中世纪神学思想的束缚,认识到人类文化是人类自然发展进化的结果,而决非超自然的成就,也就是说人类本身与人类文化并非是“神赐”的产物;而且,他还进一步认识到这种自然进化的过程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上,他注意倡导实地采集第一手资料的做法,在分析客观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原始文化》第二卷中,他着重研究了人类初始的宗教现象。他提出了“泛灵论”的观念,即认定人类初始的信仰形态是认为“万物有灵”,以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信仰逐渐繁多,慢慢地出现了“鬼神崇拜”、“多神教”、“一神教”……。

与泰勒生活的时期大致相同,美国也出现了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Henry Lewis Morgan, 1818—1881)。在《原始文化》出版的同一年(1871),他也发表了一本颇有价值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人类家庭的血缘与亲姻系统》(the 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Human Family)。他着重研究了人类的血亲关系与初始的婚姻制度。从而奠定了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血亲制度方面的基础。

继泰勒之后另一位英国学者弗雷泽(James Frazer, 1854—1941)所著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被视为文化人类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弗雷泽对原始部落人中盛行的巫术作了详细的研究,认为巫术是人类最初始的一种超自然行为。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才有了宗教信仰;随着文明更进一步的发展,才出现了科学思想。

文化人类学中的这种进化论观点，到了二十世纪初，开始遭到某些学者的批判。在欧洲出现了一批自称为“传播学派”的学者，宣传“传播论”(diffusionism)理论，认为人类的文化仅发端于世界的若干地点，然后，由此少数中心地点向世界各地扩散(或曰传播)。因此不能说各类文化是按着相类似的阶段各自逐渐进化而来的。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威尔海姆·施米特(Wilhelm Schmidt, 1868—1954)神父。此派亦称为“文化圈学派”(Kulture Kriess)或“维也纳学派”。

与此同时，在美国也出现了一个以弗兰兹·博阿兹(Franz Boas, 1858—1942)为首的新学派。他们宣称应该把人类历史视为一株“文明之树”。这棵树上生长着错综复杂的树枝，每一个分枝代表一种独特的文化丛体。怎么才能真正认识这每一个丛体呢？只能从其自身的历史中去探索。因此，该派被称为“文化史学派”。他们强调每一支文化的特殊性，怀疑一般性的理论，尤其不承认有一种普遍的进化理论。所以，他们只注重对个别民族作深入研究。

以后从该学派又延伸出一个叫做“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分支。他们着重研究个人在文化社会中所居的地位。该派出了两位颇有名望的女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7)。

二十世纪初，在英国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功能学派”(functionalist)。该学派既不赞同“进化论”的观点，亦不赞成“传播学派”与“文化史学派”的理论。他们主张把社会视作一个有机整体，认为应该着重研究社会结构在一定时期内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用他们的术语说，即研究社会制度在

结构上如何发挥其功能的。此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是阿尔弗兰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 Radcliffe-Brown, 1881—1955)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后者强调从社会成员的个人心理需求角度去理解社会的功能。他认为：文化形成一套密切相关的系统，要了解这个社会的文化整体，只能从该社会中的个人心理需求去探讨，例如各种社会风俗习惯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各种需求而相应产生和存在的。布朗认为宗教是由于整个社会机体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宗教信仰是由于个人机体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该派的理论一度在文化人类学家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兴起了一个叫做“新进化论”的学派(neo-evolutionalist)。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柴尔德(V. Gordon Childe, 1892—1957)、美国的怀特(Leslie A. White, 1900—1975)和斯蒂华(Julian H. Steward, 1902—1972)。柴尔德、怀特等强调工艺技术进步对社会文化进步的意义。他们认为早期“进化论”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但是论据不足。斯蒂华则认为早期“进化论”宣传的单线进化观点是错误的。他自称为“多线进化论者”(multi-lineal evolutionist)。他认为每一类文化均因其生态环境不同而有不同的演进路线。由此开创了“文化生态学派”。

“文化生态学派”在美国盛极一时，但与此对立的一派亦应运而生，即“文化心灵学派”。他们认为外在的生态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并不如“生态学派”所说的那么重要，强调“文化的心灵结构”或者是“先天性思维法则的作用”。该派的代表人物为美国人柯兹(Clifford Geertz, 1926—)与法国人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列维-斯

特劳斯特别强调要对人类思维的深层结构进行探索。由此逐渐创立了文化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学派”。他认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形式实质上具有同一本性，即心灵的有意识活动背后有着普遍的无意识的规律。”他把语言学的结构方法运用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宣称：在文化人类学中，人类社会文化中的每一位置以及同其他成分的关系，就象语言符号系统一样。

他还运用其结构论思想从事亲属结构、仪式行为以及神话传说的研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因而，“结构主义”理论在六、七十年代影响极大。

在整个文化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各式各样的学派纷繁复杂，此长彼消，他们都强调某一因素或方法的重要或正确。每个流派的倡导者都对他们的前辈进行了批判和修正；传播者将其主要思想加以丰富和充实。尽管“他们对十分简单的概念只是进行了简单化的驳斥”，但是，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都无疑对文化人类学的成熟和突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当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文化人类学已与深度心理学和比较宗教学相鼎立，被誉为现代最前沿、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之一，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和兴趣。它不仅对原始部落的文化进行研究，而且也分析研究当代社会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内在原因。由于它对“人、文化、社会”的研究，比较深刻地透视了人类进化、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及其规律的几个侧面；它与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人口学和宗教史的互相影响和渗透，使其突破了人类学的范畴，拓展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也影响了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为使人类不仅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而且能够深刻地理解自己，识别和容纳相同社会中

的各文化现象和不同社会中的各文化特质，开辟了新的领域和探索前景。因此，文化人类学无论在微观研究领域的深入，还是宏观认识领域的突破，都会对整个人类文化、人的心理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研究和提高带来一个新的飞跃，为人类社会科学的研究开创一片新天地。

然而，文化人类学在我国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类似欧美文化人类学那样自成体系且相对独立的学科。除解放前有些介绍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译本和少量著述外，尚无系统、全面介绍文化人类学的著作问世。尽管文化人类学中的许多名词、概念、定义及其研究方法近年来频频被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借用和注释，如“文化模式”、“文化结构”、“文化区”、“文化圈”等等，但是，人们对这些具有特定含义和颇具特色的研究法却很少提及和阐明出处。

我们认为，在中国尽快建立和发展现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人类学，已成为当务之急；应当继承并发展经典作家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批判吸收现代西方文化人类学一切有益成果；科学地总结人类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化的运行与发展规律。

为此，我们以日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绫部恒雄主编的、由东京各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撰写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一书为蓝本，联系引入当今文化人类学最新的研究成果，着重分析和论述了在学术界公认的几个权威人物的思想和学术流派，组织专门人员编译和撰写了此书。旨在对文化人类学的发生、发展、演变及整个过程作一概貌性的阐述，为关心和有志于从事文化人类学学习和研究的同行们展示一幅文化人类学的历史年表。

本书上篇着重介绍了文化人类学的九个主要流派和学术思想；下篇主要叙述文化人类学的八个重要分支学科；附录部分是对当今世界上的文化人类学总貌的简述。

我们在编撰过程中力求全面、系统、科学地进行介绍和阐述，不求语句的深奥晦涩和观点的标新立异，一切见诸于事实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编译过程中，尽量使其名词、地名、译名规范化或通俗化，以免使读者费解。但是，我们又必须说明，文化人类学及其许多专用术语在我国尚无一种规范化的概念和约定俗成的称谓。就以这门学科本身来说，就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人类学”等多种名称。在本书中，我们一律定名为“文化人类学”。

正如日本文化人类学家绫部恒雄在《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一书中指出：“如果看了某本文化人类学的书籍，就能把它完全作为代表文化人类学整体的东西来看，那么就会得出不全面的结论。”此书尽管已收进十七种文化人类学的流派和思想，但对于这个正处在繁荣发展中的学科本身来讲，远不能囊括所有。我们的努力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可以相信，在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和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下，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人类学这片园地上将会新苗茁壮、百花烂漫。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撰者功力有限，书中必有不少纰漏和谬误，恳请各位专家、同行不吝指教。

1987年5月2日于复旦大学

目 录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写在前面 庄锡昌 1

上 篇

- 一、文化进化论 1
- 二、文化传播主义 15
- 三、结构主义 29
- 四、荷兰结构主义 42
- 五、历史批判主义 54
- 六、文化模式论 83
- 七、新进化论 98
- 八、文化与基本人格论 111
- 九、文化符号论 131

下 篇

- 十、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 147
- 十一、生态人类学 170
- 十二、象征人类学 184
- 十三、法国社会学人类学 197
- 十四、认识人类学 219
- 十五、文化与心理人类学 237

- 十六、解释人类学 253
十七、现象学与文化人类学 267

附 录

- 中国文化人类学概述 281
欧美文化人类学概述 300
苏联文化人类学概述 319
日本文化人类学概述 336

一、文化进化论

(一) 背 景

究竟什么是文化或社会进化论？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应该在广泛的基础上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观念体系来认识，而不是只从人类学学说这一狭窄的意义上把握。除此之外，进化观念还是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带有十九世纪尤其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色彩。

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风暴在上一个世纪中叶暂告一段落，资本主义文明随之令人眼花缭乱地发展起来，尤其是英国，在社会、产业各方面率先成为发达国家，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所谓的帝国主义阶段来到了，殖民地经营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最终征服非欧洲领土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切意味着一个有关非西方社会的大胆的类型化和图式化的过程正在进行。当时英国知识界的活动被统称为“维多利亚科学”，也与这一时代背景有关，而且还在世上结下了达尔文主义即进化发展观念这样一个果实。这个新观念同所谓新的进步信仰一起开始在欧洲社会居支配地位。华莱士 (Wallace, A.R., 1823—1913) 和达尔文 (Darwin, Ch.,

1809—1882)的生物进化论实际上也只是这种整体倾向的一种表现。

因此，一般认为，达尔文学说对社会科学具有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实际普及“进化”这个词和首次使用“适者生存”这句话的人，是社会学家斯宾塞（Spencer, H., 1820—1903）。巴霍芬（Bachofen, J. J., 1815—1887）、梅恩（Maine, H., 1828—1888）的著作都出版于1861年，不能认为他们受了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巴霍芬还在《物种起源》一书出版的前三年就已开始讲授《母权》一书的主要思想了。十九世纪后半期有代表性的学者不胜枚举，其中有泰勒（Tylor, E. B., 1832—1917）、摩尔根（Morgan, L. H., 1818—1881）、巴霍芬和梅恩等等。

那么，文化进化论是突如其来地出现的吗？进化论导源于十八世纪启蒙思想时期的孔多塞（de Condorcet, M., 1743—1794）和杜尔哥（Turgot, A. R. J., 1727—1781），后又由黑格尔（Hegel, G. W. F., 1770—1831）、孔德（Comte, A., 1798—1857）、圣西门（Saint-Simon, C. H., 1760—1825）等人进行了传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证主义的文化进化论和启蒙时期的思想一样，在概念形成方面都是以文化和社会中的人的同一性为前提的。但是前提相同并不意味着内容也相同。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开头叙述的是人类起源的单一性、同一发展阶段中的人类欲望的类似性，以及同一社会条件中的人类精神作用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只有考察人类同质一般的历史环境才能理解文化和社会所具有的合理性。这说明文化和社会是根据发展阶段区分的，并不是始终处于同质的单一连续线上的。